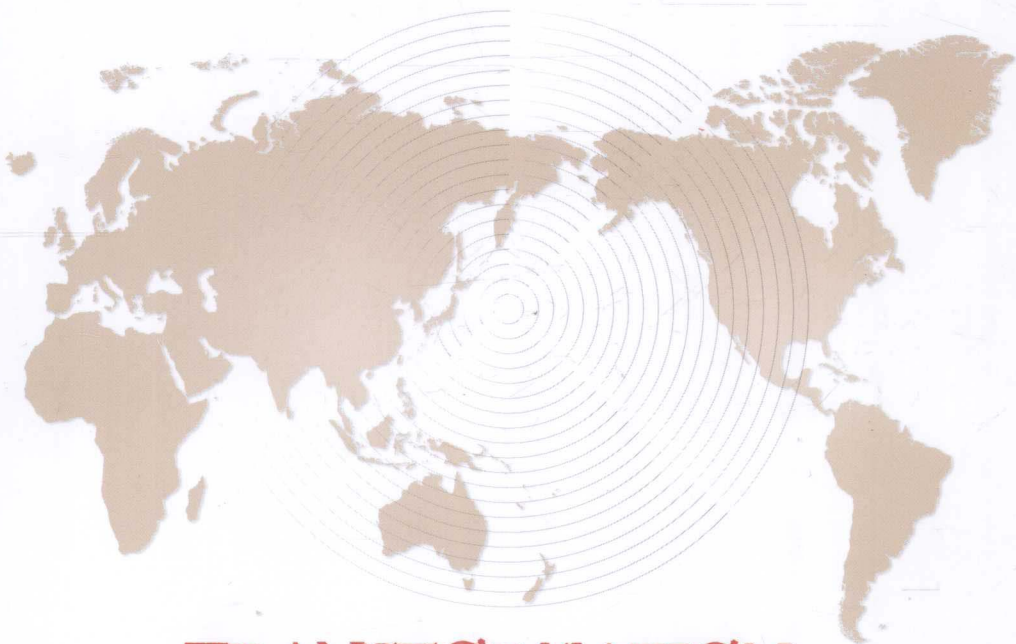


转型要素成本上升 与中国外贸方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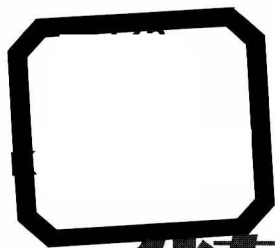
张燕生 杨长湧 蒋钦云 程海星◎著



TRANSFORMATION
FACTOR COST RISING AND
CHINA'S
FOREIGN TRADE STRATEGY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转型 要素成本上升 与 中国外贸方略

张燕生 杨长湧 蒋钦云 程海星◎著



TRANSFORMATION
FACTOR COST RISING AND
CHINA'S
FOREIGN TRADE STRATEGY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 要素成本上升与中国外贸方略/张燕生, 杨长湧, 蒋钦云, 程海星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136 - 1578 - 5

I. ①要… II. ①张… ②杨… ③蒋… ④程… III. ①中国经济—对外经济—经济发展—经济模式—研究 IV. ①F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6829 号

责任编辑 聂无逸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常 毅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市昌平区新兴胶印厂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6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1578 - 5/F · 9330

定 价 39.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致 谢

Acknowledgment

本项研究应当特别感谢香港溢达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敏德女士,副董事长、溢达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车克焘先生的大力资助以及贡献的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

We sincerely thank Ms. Marjorie Yang, Chairman of Esquel Group, and Mr. John Cheh, Vice Chairman of Esquel Group, and Chairman of Esquel China Holdings Ltd, for their generous financial support and valuable viewpoints to the project.

前 言

据中国统计局的初步测算,我国 2012 年前三季度 GDP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7.7%。其中,一季度增长 8.1%,二季度增长 7.6%,三季度增长 7.4%,仅高于 2009 年一季度 6.6%。从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2%。

当前,全球经济确实更加错综复杂。首先,在 IMF 最新公布的经济预测报告,将 2012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降至 3.3%,是 2009 年以来最低增速。同时,IMF 还下调了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预计中国和印度 2012 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是 7.8% 和 4.9%。其次,目前国际各机构最新公布的全球、欧美、中国的先行指标 PMI(采购经理指数)大多在 50% 以下,这说明全球及主要国家经济尚处于收缩状况。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先行指标多数是 2009 年 6 月以来最低的。再次,当前美、日、欧的整体经济都不差钱,但问题是钱就是进入不了各自的实体经济部门。如美国大公司目前整体上已经度过危机难关,手中持有的现金额已显著超过危机前的 2007 年,但这些大企业就是不愿扩大投资和扩张。这主要反映大企业对欧美及全球经济的未来前景预期悲观。第四,美、日、欧的政府财政(和银行)都缺钱,财政危机、财政悬崖、财政紧缩,直接制约了它们重振经济增长的调控能力。最后,大家都不想浪费这场危机,都希望通过这场危机推动本国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如美国要重振高端制造业,欧洲要深化财政和货币一体化,日本要搞第二次明治维新,金砖国家也在推动结构调整。但是,2007 年以来危机已过 5 年了,美、日、欧经济仍深陷“缺需求、缺信心、缺办法”的泥潭中挣扎。它们的短期经济复苏主要靠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由此必然拖累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而长期结构调整将是一场世界竞赛,如果不能有效利用这场危机加快加大调整,就势必在新一轮竞赛中被淘汰出局。

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主要不是短期的稳定增长问题,而是中期调

结构和长期促改革、转方式的问题。首先,我国 GDP 的潜在增长水平将下调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下调后的可持续增长水平估计在 7% 至 8% 之间。如果 2012 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能够保持在 7.5% 左右,就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增长率。其次,在全球经济和外贸减速、我国经济和引资减速的综合作用下,2012 年我国外贸增长减速将成为定局,预期增速将从过去的 20% 以上下降到个位数。对此,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下降的宏观影响,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和焦点。事实上,我国“大进大出”的外贸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外贸和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减速已基本成为定局。即使各地采取更激进的招商引资策略,启动更大规模的投资项目,更努力地追求 GDP 优先目标,也只会延缓减速进程,同时会更趋近于增长极限。对此,只有把握危机调整的机遇,加快推进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才可能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第四,我国重化行业、建筑和房地产行业以及与之相关的装备制造业也将进入一个长期调整时期。在美国金融和房地产泡沫与中国高增长时期叠加所形成的巨大产能,将进入一个需要脱胎换骨转型的痛苦期。最后,我国已经进入要素价格全面上涨的时期。其中既包括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成本持续上升,又包括人民币汇率、利率和消费者价格指数,还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环境成本。这些成本上升主要是刚性的、长期持续的、结构性因素驱动的,并对供给端转型和升级带来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

2012 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转折年。虽然我国 2012 年第三季度 GDP 增长 7.4%,是 2009 年二季度以来 14 个季度的新低。但与 1998 和 2008 年应对危机的形势不同,2012 年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宏观经济在呈现出总量减速、外贸下滑、效益下降的同时,还发生了结构优化、就业增加、城乡和区域差距缩小等新变化,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对此,我把它概括为宏观经济减速下的调整之谜。

一是“就业之谜”。2012 年前三季度 GDP 减速而就业形势依然很好,这是为什么?有两组数据的对比,一是“十一五”时期,GDP 年均增速 11.2%,而城镇年均新增就业只有 1140 万人,虽然“十一五”年均新增就业比“十五”多增加 210 万人,但却低于 2012 年,如 2012 年前三季度,GDP 增速 7.7%,城镇新增就业 1024 万人,将超过“十一五”的年均就业水平。仅仅用就业是滞后变量的说法,难以解释 2012 年就业弹性变化。二是 2012 年前八个月,

浙江省城镇失业率 3.12%，是 14 年以来最低的。一方面，浙江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就业形势依然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省服务业就业增加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二是“工业之谜”。2012 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0%，其中股份制企业增长 11.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6.0%；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6%，中部地区增长 11.6%，西部地区增长 12.8%；发电量增长 3.6%，钢材增长 5.7%，水泥增长 6.7%，十种有色金属增长 7.1%，乙烯下降 2.9%，汽车增长 7.3%，其中轿车增长 8.4%。这三组数据，即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低、东部增速低、重化和汽车增速低，究竟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是周期现象还是结构性现象，是需要政策扶助还是加快转型，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是“收入之谜”。2012 年前三季度 GDP 减速而民生得到更好的保障和改善。不仅城乡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速超过 GDP 的增速，而且农业人均实际收入增速高于城镇，这用收入变量是滞后变量也是难以解释的。2012 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427 元，同比名义增长 13.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6778 元，同比名义增长 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2.3%；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 16867 万人，同比增长 3.0%；前三季度，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 2249 元，同比增长 13.0%。

四是“转型之谜”。2012 年是我国企业的转型和调整年。一方面，大企业效益好，但缺少转型的压力和动力。在世界 500 强中，2012 年中国内地入围企业数量为 70 家，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 500 强企业的第二大来源地。但入围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金属产品、公用设施、采矿与原油生产、工程与建筑、商业储蓄银行等领域，基本上都属于传统产业。如果不加快转型，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这些大企业将很难获得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普遍面对“缺订单、缺工人、缺技术”的转型之痛。解决“缺订单”问题，需要创造条件帮助企业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建立新渠道、完善售后服务等努力和措施配套。解决“缺工人”问题，需要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劳工保护条件和标准。解决“缺技术”问题，需要重视产学研、大中小、国内外、军与民合作研发，保护知识产权，完善技术公共服务体系等。当前的问题是，小企业的“转型之痛”缺少系统的配套支持性措施。

这说明,2012年的转型年,既是短期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一年,也是中期加快结构调整的一年,还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年。总之,是在前30年改革开放取得显著业绩的基础上,探索未来30年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一年。

一是以2012年为转折点,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高标准市场经济规则接轨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首先,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功能边界。从制度上改变教育、医疗卫生、政府及事业单位过度商业化的逐利倾向,从根本上解决好政府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确保国家安全、规范社会管理、完善公共服务、保持宏观协调等方面的作用。其次,建立包容性发展而不是排他性发展模式。1998年以来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中,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但老少边穷地区的政府、县及县以下的政府财政欠账甚多;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呈快速上升趋势,但小企业的创业环境仍待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则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这种局面必须尽快加以改变。再次,建立法治和基于规则行事的制度,从“摸石头过河”向法治和规范转变。包括建立破除垄断,规范市场、制约权力,机会公平为中心的新制度框架。

二是以2012年为转折点,推动不平衡发展战略向平衡、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首先,加快推动过度依赖出口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向扩大内需战略与经济国际化战略互动的方向转变。其次,加快推动从“先让少数人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从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转向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从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转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三是以2012年为转折点,加快实施供给管理政策。首先,采取大幅减税的政策,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促转型;其次,减少政府过度管制或干预,让市场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加快转型;再次,鼓励研发和技术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大中小企业合作、军民合作、国内外合作,提高研发创新的投入和产出效率;最后,提升人力资本,重视教育和培训,为培育和提升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打好基础。

四是以2012年为转折点,大力发展知识型高技术现代服务业。提升我国研发设计、制造工艺、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商务和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能力,满足制造业对现代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五是以2012年为转折点,大力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研发代工与制造代工并举;服务进口与出口并举;人才国际化与服务本地化并举;市场导向与政府统筹协调并举的经济国际化新优势。

为此,我们组织了几位年轻的研究人员,把初步研究成果写出来,供朋友们批评指正。其中,张燕生撰写了第一章《中国竞争优势转型升级所面临的挑战与前景》,提出了一个“2016年猜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然而,事实上,2016年以及以后的三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坎”。中国体制机制、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大转型、大调整和大变革将发生在2012至2016年前后,中国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时点也是2016年,中国可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印度等巨量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时点也很可能发生在2016至2019年。在这个时期,我国将进入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告一段落,新竞争优势尚在培育和形成中,体制机制和战略转换仍在进行中的转型之痛过程。如果处理不好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境内外、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就可能陷入前30年未发生过的大冲击和大动荡,甚至是一场内部冲击引发的危机。其他各章分别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杨长湧博士撰写第二章《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现状、演变趋势及应对策略研究》、第六章《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应对策略研究》和第八章《进一步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蒋钦云完成第三章《中国土地价格变化的现状、影响及国际比较分析》、第四章《我国能源资源价格变化现状、影响分析及应对策略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程海星(现就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完成第五章《环境成本上升对传统竞争力的影响》;张燕生完成第七章《通过资本输出创造出口需求研究》。

我国在要素成本上升驱动下加快推进经济转型,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研究的问题,本书可能还存在一些论述不够完整、观点有待商榷、实证尚待加强等缺陷,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2012年8月8日

CONTENTS |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竞争优势转型升级所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 001

- 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001
- 二、“2016 年猜想” 002
- 三、国际竞争的输者可能是谁? 005
- 四、中国在赶超中走向大国经济 006

第二章 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现状、演变趋势及应对策略研究 / 009

- 一、文献综述 010
- 二、劳动力成本概念的界定 012
- 三、我国劳动力成本演变的历史和现状 013
- 四、我国劳动力成本未来的变动趋势 021
- 五、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024
- 六、企业和国家的应对策略建议 029

第三章 中国土地价格变化的现状、影响及国际比较分析 / 032

- 一、中国土地市场形成的历史回顾 032
- 二、中国土地价格变化的现状、原因分析 035
- 三、土地价格的国际比较分析 043

第四章 我国能源资源价格变化现状、影响分析及应对策略研究 / 054

- 一、铁矿石价格变化趋势分析 054
- 二、煤炭价格变化趋势分析 058
- 三、石油价格变化趋势分析 065
- 四、水资源价格变化趋势分析 072

五、电价变化趋势分析	079
六、能源资源价格上涨的应对策略建议	086

第五章 环境成本上升对传统竞争力的影响 / 089

一、环境成本的现状及趋势	089
二、环境成本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机制	094
三、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	096
四、国家和企业的调整方向	097

第六章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应对策略研究 / 101

一、国外施压人民币汇率的历史及特点	101
二、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的意图分析	104
三、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的合法性分析	108
四、未来美国向人民币汇率施压可能的方式及其有效性分析	113
五、应对人民币汇率压力的策略分析	115

第七章 通过资本输出创造出口需求研究 / 118

一、重视资本输出在创造我国出口需求中的作用	118
二、重视资本输出在调整贸易生产体系中的作用	123
三、资本输出和“走出去”战略的重点转变	126
四、我国企业资本输出和“走出去”的主要方式	129
五、积极探索资本输出创造出口需求的新模式	131

第八章 进一步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研究

——东莞调研思考 / 134

一、我国对外贸易体系的二元结构特征	134
二、加工贸易的历史贡献	138
三、目前有关加工贸易存在问题的若干观点	139
四、东莞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情况	140
五、下一步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方向	142
六、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的几个问题	146
七、政策建议	150

| 第一章 |

中国竞争优势转型升级所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最近几年,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热衷于预测和计算中国何时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出,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2016年中国GDP将由2011年的11.2万亿美元(201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约6万亿美元)升至19万亿美元,而2016年美国GDP将由2011年的15.2万亿美元(2010年14.7万亿美元)升至18.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①。

上述有关预测都暗含着一个重要假定,即中国目前赶超的趋势不会发生减速、停顿甚至逆转的可能性。如果发生了趋势逆转的可能性,如日本从1990年以来陷入长达20年的经济减速甚至停滞的情况,赶超的路径就有可能从不断趋近到弯道超车,转向弯道减速甚至刹车,从而扩大而不是缩小赶超的差距。因此,这里讨论问题的重点不是何时超越美国以及如何预测的问题,而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赶超战略以及如何保证中国的增长趋势长期持续的问题。

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 Angel Gurría 曾经说过,“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时,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像中国

^① 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1年4月。

的崛起那样引人注目。可是,当他们进一步放开历史视野时,他们将看到的那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①。

根据世界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1820年,中国经济的总规模占世界经济总规模的比重高达32.9%,远高于同期欧洲经济所占比重26.6%、印度的16%、日本的3%、美国的1.8%、苏联的5.4%。然而,在1820—1839年间,英国用鸦片贸易换取贸易平衡,每年运到中国的鸦片从4000箱增长到4万箱(Greenberg,1951)。1839年,清王朝政府实行禁烟,英国发动对华战争。为此,中国支付了英国600万两白银的鸦片赔款、2100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②。

1840—1950年,中国的GDP从占世界总量的1/3降到了1/20。到了1952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虽然还高于印度和日本,但已经被欧洲、美国和苏联所远远超过。1952年,中国的人均GDP实际上是退回到1890年的水平。而同期,日本的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欧洲提高了4倍,美国提高了8倍。

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始于新中国建国的60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总规模在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成为下一个赶超的目标。然而,中国的追赶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长期的发展意味着迟早会进入长期的调整。过去的30年,我们成功地跨越了低收入陷阱,下一步能否把体制机制和战略调整到一个新的结构层次上,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严峻考验^③。

二、“2016年猜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然而,事实上,2016年以及以后的三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坎”。中国体制机制、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大转型、大调整和大变革将发

① Angel Gurria,“序言”,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张燕生,《中国经济国际化:阶段、特征和成就》,编入《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生在 2012 至 2016 年前后,中国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时点也是 2016 年,中国可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印度等巨量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时点也很可能发生在 2016 年至 2019 年。

这意味着到 2016 年,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能源、人民币汇率等要素成本和资产价格显著持续上升,我国持续 30 年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将逐步衰竭,到 2016 年很可能成为一个拐点,即我国经济将从低成本要素的投资驱动阶段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到此,我国企业的低价格竞争策略必须要改变,支撑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必须要改变。否则,就很可能出现旧竞争优势不再,新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已经形成巨大的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支撑力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减少、社会负担日增和环境压力强化的长期调整困境。

这意味着到 2016 年,我国经济体制机制、发展战略和结构必须要发生大的改变。首先,外向型经济模式必须发生大的调整。即使是改革开放前 30 年证明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战略,但它毕竟是小国战略。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如果继续依赖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势必将恶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因此,战略调整的方向应是扩大内需与经济国际化之间的互动,把扩大出口转化为全球投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全球服务的资本输出带动出口多元化战略。其次,不平衡发展战略必须发生大的调整。从“先让少数人富起来”,走向实现“共同富裕”;从先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走向顾及中西部发展的另一个大局,实现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从先让经济建设率先搞上去,走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意味着改革开放前 30 年不平衡发展战略将实现公平与效率在更高层次上的统筹协调和平衡。再次,“摸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必须发生大的调整。从试验到规范,从“摸石头过河”到建立基于规则和法治行事的新体制基础,从政府作为经济建设主要推手到政府职能回归公共服务,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变革的重点。然而,市场经济中形成的特殊利益机制严重阻碍着深层次改革。

这意味着到 2016 年,一方面,我国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国外企业再也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依据中国加入 WTO 议定书第 15 条轻易对我国产品实施反倾销诉讼了。但是另一方面,“新 15 条”正在形成过程中。从针对中国

具体产业或产品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技术贸易措施等传统手段,转向针对中国自主创新、政府采购、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土地制度、信贷体系等国内竞争政策而出台相应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当我国企业的成本和价格也不再便宜,比我国企业成本更低的国外新竞争对手正逐步取代并占据我国传统出口市场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和冲突将恶化我国外部经贸环境,使“未来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

这意味着到 2016 年,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将可能出现逆转。一是贸易收支将趋于平衡,但可能出现刀锋上的不稳定平衡。主要表现在和一般贸易巨额并存的平衡,有可能随着我国综合投资成本持续上升,加工贸易巨额顺差出现对外转移而打破。二是直接投资项目(FDI 和 ODI)将趋于平衡,但外商来华投资收益丰厚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风险、低回报成为一种不对称的平衡^①。一方面,外商来华投资结构的变化将对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如来华投资房地产、市政建设和大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大幅增加,投资制造业的比重急剧减少;投资内销项目的比重大幅增加,出口的比重大幅减少;来自避税天堂和自由港的资本大幅增加,来自欧、美、日、韩实体经济的投资明显减速。这不仅不会增强出口增长能力反而会持续增加进口,同时,它受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要明显大于综合投资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在 2016 年前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有可能等于甚至大于来华直接投资。加上人民币“走出去”将伴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开放进程加快,证券对外投资和其他对外投资规模日益增加,导致整个金融和资本项目趋于平衡。但这种平衡是较为脆弱的,很容易被资本大规模流入和流出所打破。三是我国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净收益为负的状况仍难以改变。2011 年底,对外金融资产 4.72 万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 2.94 万亿美元,对外净资产 1.77 万亿美元,净收益为 -268 亿美元。到 2012 年 6 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 49462 亿美元,其中 ODI3923 亿美元(8%),证券投资 2593 亿美元(5%),其他投资 9798 亿美元(20%),储备资产 33148 亿美元(67%)。对外金融负债 31974 亿美元,其中 FDI19032 亿美元(60%),证券投资 3011 亿美元(9%),其他投资 9932 亿美元(31%)。对

① 张燕生、张岸元、姚淑梅:《现阶段外汇储备的转化与投资策略研究》,《世界经济》2007 年 7 月。

外金融净资产 17488 亿美元。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在未来 3 至 5 年内,就会导致我国的顺差来源下降。到 2016 年前后,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和差额趋势有可能发生逆转。对此,如何促进自主内生性出口因素的增长,实现发展方式和结构的根本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起步和今后的努力。

三、国际竞争的输者可能是谁?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一位美国专家说,如果中国与美国竞争,输者肯定是中国。这个问题一直引发思考,如果赢,我们会赢在那里;如果输,会输在那里?

当年,日本与美国发生激烈的贸易摩擦时(1985—1995 年期间),日本和美国的 GDP 分别占全球份额的比重,1985 年分别是 10.6% 和 32.7%,1995 年分别为 17.9% 和 25.0%。然而,到 2007 年分别为 8.1% 和 23.5%。贸易战最终以日本全面失败而告终。1980 年,日本的人均 GDP 为 9138 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 GDP 的 74.6%,1987 年,日本人均 GDP 首次超过美国,1995 年,日本人均 GDP 是美国的 1.5 倍。然而,2000 年以后,日本人均 GDP 只相当于美国人均 GDP 的 87.2%。

在这场竞争和较量中,日本究竟输在那里? 1979 年,世界各国面对着“滞胀”困境。当时,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是相对好的,而美国则是相对差的。然而,从 1980 年开始,欧洲是从“治胀”的角度走出了“滞胀”,其代价是高失业率换来低通胀率。而美国是从“治滞”的角度走出了“滞胀”,其代价是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到 1985 年,美国由于高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使其供给端结构调整很难继续下去。为此,西方五国召开了会议研究对策,最后达成了“花园广场协议”。其中的对策之一是日元大幅升值以解美国高汇率困境。1985—1987 年,日元从 1 美元兑 250 升值到 120,并且持续下去的时候,日本面对如何应对泡沫经济和如何化解产业二元结构(即低效率产业,如农业、分销业、银行业、不动产业以及内销为主的制造业无法消化日元升值的冲击)的双重困境。其结果是到了 1990 年,日本陷入了长达 20 年的低速和停滞,美国却迎来 IT 革命和新经济繁荣。

事后,无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日本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日本输在泡沫经济应对不当。然而,同样是美国应对 2001 年的 IT 泡沫

和2008年的金融楼市泡沫经济不当,造成了一场几十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会输吗?不会,为什么?当前,美国走向经济复苏的主要手段,中短期主要是扩大出口(5年出口倍增的振兴计划)和量化宽松(以QE3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泡沫经济的开始),长期是回归高端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出口和回归高端就业岗位创造的机构调整,美国的这个结构调整期估计至少需要10年。谁将为美国中长期结构调整埋单?

关于发展模式的调整,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即美国应当扩大出口而中国应当扩大进口。在全球需求持续萎缩的情况下,美国采取促进出口翻番的战略,只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事实上,美国应当调整其低储蓄、高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其过度依赖金融部门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全球化即美国化的价值取向。但是,美国会发生这样的调整吗?不会。反过来,全球经济再平衡、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等议题,都成为中美竞争和较量的关键问题。如果全球再平衡的责任方是顺差端而不是逆差端;如果量化宽松下的人民币升值成为热钱进入、国际套利、国内通胀的主要来源而顺差依旧;如果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而中国对美投资企业屡屡受到歧视;如果8000亿政府采购市场充满合资和进口的中高端商品,等等,中国的赶超前景还会乐观吗?可见,赢得国际竞争所需要的大智慧,就是看谁能够真正有效把握未来10年的结构调整期,切实解决制约本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和关键环节,依靠自主形成独立的竞争优势。

四、中国在赶超中走向大国经济

首先,我国从经济意义上的人口大国转变成开放大国,确实还有一个较长的路要走。在理论上,一个经济意义上的开放大国是世界主要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价格的追随者;是国际重要规则制定和修改的决定者,而不是规则的接受者;是国际重大责任的承担者或逆周期调节者,而不是责任推卸者或顺周期参与者。

中国目前在世界很多重要领域都是个大块头,但在价格、游戏规则、责任担当等方面,依然是一个追随者。如中国是世界铁矿石进口的最重要市场之一,却没有取得定价权。中国要取得定价权,就必须透彻地了解钢铁和